

# 目 录

前 言		
深刻的印象 亲切的关怀 ——回忆朱德同志路经资阳停车休息的情景 张积楷 张振田		1
贺龙元帅来资阳 魏永清口述		5
英烈颂	余国桢烈士革命事迹 蒋中青	8
	抗日殉国将领饶国华烈士 郑碧芯 舒代铭	24
文 苑 春 秋	现代作家邵子南纪略 徐伯荣	19
	书法家杨太常生平简介 杨汝猷	43
	清翰林汪致炳事略 汪海澜	78
教 坛 史 话	资阳私立存诚初级中学简史 秦季勋 杨交朴	68
	花溪流水正奔腾 ——花溪小学创建纪实 陈立卓	63
雁 城	解放前资阳饥民“抢米”目睹记 魏泽民口述	31
	闲话袍哥 肖经林 罗建文	37
旧 事	忆解放前资阳竞选立法委员的一个片断 汪海澜	46

雁 城	彭泽惨案见闻	兰智能	49
旧 事	城隍·庙会·资阳河	杨天相	58
工商史谭	临江寺豆瓣	徐树墉	33
	资阳县的基督教	陈绍竣	51
	资阳县名探源	文史办	66
	“冒儿头”与“亮油壶”	徐 雨	75
史 海	『资阳人』	·佚名·	86
	张传相辞官记	马光宗	84
拾 贝	轶史趣闻	陈泽普	83
联语拾零	挽联一副悼忠魂	马光宗	82
趣诗赏析	一首费解的即景诗	李明德	85
诗 词	悼夏长生、梁培德两烈士(诗)	罗明萱	81
	满江红(词)	彭禹九	87
集 萃	贺新凉(词)	罗明萱	77
	撰写回忆文章的十要十忌	(编者)	74

## 深刻的印象 亲切的关怀

——回忆朱德同志路经资阳停车休息的情景

张积楷 张振田

一九六一年四月，时值春末夏初，气候温和，百花竞放，绿树成荫。十三日清晨，资阳县委、县人委得到上级通知，本日有中央领导人路过资阳，可能要在资阳火车站停车休息。当时的县委书记冯立泰、县长张登安、县委副书记鲁绍彬、组织部副部长张积楷、县人民武装部政委康励志、政法党组书记张振田等于九点钟以后前往火车站迎候。

大约在上午十点三十分，只听远远汽笛声传来，一辆专列从莲花山转弯处出现，车头吐了一口黑烟，隆隆地驰进资阳车站。漂亮、整洁的专列由七、八个车箱组编而成。这时负责站区保卫工作的公安人员等距离散开，用立正姿势整齐地站在车站建筑物外面；铁路职工身着兰色制服立正站在站台线上，候车室房顶的高音喇叭响起了欢快的乐曲，人们的双眼注视着车箱门口，都以先睹中央领导人为快。

专列停稳后，冯立泰书记、张登安县长等立即迎上前去。只见各个车箱的女乘务员，都已经各就各位，站在各车箱门口。她们的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一律穿着灰色列宁式

• 1 •

这时在第三个车箱门口，走出一个五十岁出头的中等身材的大姐，她还未下完车梯，迎上前来的康励志就喊：

“康克清同志，你们辛苦了。”

康克清抬头一看，亲切地答道：“你是小康吗？”

正在对话时，康克清身后有两名女青年扶着朱德总司令从车梯走下来。朱总随着康克清的话音问道：

“那是哪个呀？”

“是小康（指康励志）。”康克清回答说。又重复一句：“就是当年在总部那个小康呀！”

朱总略作回忆，好象想起来了：“啊！”

朱总风趣地问康励志：“你当什么官呀？”

“任本县人民武装部政委。”康答。

“很好嘛。……啊，你在资阳。”朱总说。

朱总的随行人员，包括四川省委统战部长程子健等，都下车了。康励志把我们上前迎接的五个人一一向朱总作了介绍，朱总都热情地同每个人握手。他这天身穿普通兰色平布中山服，头戴兰布制帽，拄着手杖，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康励志对朱总说：

“我离开延安以后，随时都很想念你们（指朱总和康克清），很想继续留在你们身边。”

朱总问康励志家有多少人，都在做什么。康作了回答之后，朱总说：

“照个像留作纪念嘛。”

朱总从他的上装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笔记本，亲切地对我们说：“都留个名字和通信地点，以后好联系。”

我们这六个人依次在朱总的笔记本上写好自己的单位和

姓名，朱总的随行秘书和记者，接着走来安排照纪念像。拍照时，张积楷站在朱总身后，朱总慈祥地操着四川口音对张说：

“小伙子，要站在空空（读控音）中间，才照得出影子。”他边说边用手来拉张站在他和康励志两人背后的中间。

拍照后，大概是朱总想看一下车站周围的环境，朝着上行的方向漫步走去，没有走到十公尺远，随车保卫的四川省公安厅刘景周厅长就上前向朱总说道：

“前面没有什么了。”

朱总又转回下车的地方，他关切地问冯立泰同志：

“资阳人民的生活如何？”

“资阳出什么土特产？”

“资阳的建设搞得怎么样？”

“资阳的社会治安状况如何？”

县委书记都一一向总司令作了汇报，当介绍到资阳出产的临江寺豆瓣，是比较著名的土特产品，年产量约为三十万斤时，朱总说：

“少了，可以多生产些来出口嘛。”

朱总听了关于资阳社会治安情况的汇报后，指示说：

“关键是要搞好生产，物资丰富了，大家吃得饱穿得暖，社会治安就有可能根本好转的”。

朱总在倾听了资阳人民当前的生活状况后，连连说：

“你们要搞好，你们要搞好。”

朱总司令殷殷训勉地方党政领导要搞好工作，使在场的同志深受鼓舞。

不一会，康克清就向专列工作人员说，可以开车了。列车乘务员立即各就各位。两名女青年搀扶朱总上了车。汽笛一声长啸，铁轮缓缓起动，专列便向内江方向前进了。

一九六二年初，冯立泰去北京出席中央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向朱总提出要在资阳车站合影留念的照片，朱总通知秘书转给他带回分送给了六个同志。

事隔二十三年了。朱总司令虽然早已与世长辞。可是他那魁伟的身材，慈祥的面容，朴素的衣着，亲切的教诲，仍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里。他在耄耋之年还深入基层视察工作。在困难时期十分关心资阳人民生活的优良革命传统作风，是我们后辈永远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 贺龙元帅来资阳

魏永清口述 文史办整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资阳解放。同月二十四日原国民党军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于彭县起义。他的部队有两个师和兵团团部于五〇年初开到资阳驻扎，待命整编。该部一小撮下属反动军官，暗中勾结地方上的地主、土匪武装，私卖枪支，制造谣言，抢购物资，破坏币制，蠢蠢欲动。一度使资阳城区乌云翻滚，形势紧张；乡间土匪猖獗，枪声起伏，人心很不安定。那时我在下西街魏家祠经营大华旅馆，受到社会治安秩序不好的影响，过往旅客稀少，生意萧条，门可罗雀。眼看年关在迩，内心十分焦急。

记得在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旧历腊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时许，突然从西门方向开来大小汽车十多辆，到我店门口停下来。从车上下来的人都是头戴红五星帽徽的解放军，估计约有一个连的人数，其中一个解放军同志向我说：“我们首长今晚要在这里住宿。”一会儿，旅馆附近的天主堂、进士牌坊、武成巷、八角井以及旅馆门口都站了岗哨，一位解放军同志很有礼貌地告诉我，叫我家里的人今晚不要出街去了，因为店门口站岗的认不倒，进出不方便。这时我还不知道住在店内的首长就是贺龙元帅，我一家人只好呆在店内，没敢出门。

大约是晚上八点过钟，罗广文独自一人来到旅馆，由一名警卫员领着进去会见了那位首长。过一会，资阳县委左咏政委和资阳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高毅一道走进旅馆，他们得知首长正在与罗广文谈话，便径直走进首长住的房间。约莫十点过钟，谈话完毕，左、高两位党政领导和罗广文就走出去了。

我正要去睡觉，这位首长走出了寝室。我看他没有戴军帽，身穿一件黄色皮贾克，嘴上留着十分整齐的一字胡子，身材魁伟，气宇轩昂。他向我打了招呼，问我：“你是店主吗？”

我拘谨地回答道：“是。”

“我叫贺龙。”他自我介绍说。态度显得很随和而亲切。

贺老总的名字，我早就听说过，而且还听过他一把菜刀闹革命的神话般地传说，没想到今天睡在我店里的首长，原来还是他，我的心情顿时既惊异又紧张，不知道手脚放在哪里才是。

“到屋里坐坐。”我真没想到贺龙元帅还让我进他住的寝室去谈话。他关心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家里有多少人？祖籍在哪里？”我都一一地作了回答。当我说到祖籍在广东时，他指着旁边坐的那位首长笑着向我说：“你和周军长是同乡罗。”

由于贺老总态度和藹可亲，平易近人，我的紧张心情和拘谨窘态自然而然的就消除了。话题转到询问资阳解放后的情况，我说当前主要是土匪猖獗，民心不大安定，不知道要好久才能改变这个局面啊。

贺龙司令员听了我的陈述后，向我解释说：“这点土匪算不了啥，你要相信不久就会平息的。蒋介石八百万军队都被我们打垮了，区区土匪骚乱的日子是不会长的。”他这一席话，解除了我思想上不少的忧虑，心情顿时开朗了许多。

我和贺龙司令员、周军长一直说到近十二点才休息。

第二天吃早饭时，贺龙元帅还叫人在隔壁品香饭馆炒了一份鱼，饭后就上车走了。一个月以后，罗广文的部队也向东开拔了。后来，我才听说贺龙元帅，是从重庆去成都，在路过资阳时，因天色将晚，才停车投宿的。当晚同他住在一起的周军长就是周士第将军。

三十三年过去了。他匆匆来去资阳的情景以及音容笑貌，仍时时在我的脑海里展现，令人难以忘怀。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中，他惨遭林彪、“四人帮”诬蔑迫害，含冤去世。想到这些，我心情总感到十分难过。

# 余国桢烈士革命事迹

蒋忠菁

## 布衣两件 高粱半升

余国桢，名治平，一九〇七年四月生于资阳县南津驿乡下，后迁居南津镇上。家清贫，祖父是拖船工，父亲当学徒，帮人染布。祖母和母亲纺纱织布，无纺车，就用作过篾竿的竹子做成手摇纺花车。至其父余炳章壮年时，以高利向地主余仲权借得五百吊铜钱，在镇上开简易染房，从事手工劳动。

国桢五岁，母亲已生二弟（三岁），三弟（一岁），都因麻疹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全家三代五口，常以沙罐煮红薯、牛皮菜，充饥延命，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

国桢七岁，时值腊月年关，连日大雪，染房生意萧条，无钱偿付利息，其父外逃躲债。除夕，地主唆令地痞、狗腿，来余家逼债，破口辱骂，翻箱倒柜，将染房所收布料洗劫一空。余家准备“团年”的一点油盐酱醋，也被倾倒在地，劫后只剩高粱半升，地痞、流氓嚎叫而去。

当天下午，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染房被劫后，余母将国桢搂抱在怀内，凄然下泪。国桢虽年幼，竟以温语宽慰母亲：“等我长大，出去挣钱回来，把帐还清，谁敢再来欺负

我们！”

接着，一位孤独无依的老太婆冒雪前来染房取布。余母含泪，诉说被劫的情景，祈求老太婆体谅。余国桢却毅然将一件换洗衣服找出，又从身上脱下贴身汗衣，包在一起，恭恭敬敬递给老太婆以作抵偿，老太婆再三推让不得，才挟着布包走向漫天风雪之中。老太婆似觉布包沉手，回家打开一看，内有半升高粱。小小国桢的这一义举，一时在南津驿乡下传为佳话。陈平三（即陈仲秋，金堂县人）同志在追忆余国桢时写道：“他对人诚恳、坦率，乐于牺牲自己利益，经常给人无私的帮助。”这种高尚品德，在他童年时就开始孕育了。

### 勤学苦练 扶弱惩强

一九一七年，余国桢刚满十岁，在干杂活间隙中向人求教，读书识字，逐渐能背诵《论语》中一些章句。父母见其勤奋，有志向学，便节衣缩食，送国桢到镇上私塾读书。

余国桢在学馆，敬师爱友，发愤攻读，成绩很好。特别喜欢古典文艺书籍，除读《三国志》、《水浒传》外，对冻胜、吴广、李自成等历史故事尤其兴趣浓厚。他对孙中山先生也备极崇敬，常常带领学友在河滩上扮演各种角色，做打富济贫、惩霸除奸之类的游戏。

国桢为学孜孜不倦，写得一手好字。他常独自到河滩，用树枝作笔，在河沙地上练写大字，对一些繁难生字，写好又抹，抹去又写，每至数十次不知疲倦。他在一篇题为《说俭》的论说中写道：“俭者，美德也，可以养成古朴诚实之风，以去骄奢之习。”由于他品学兼优，深受老师和学

友的喜爱。

学馆老师李辉典是位乡试不第的穷秀才，为人正直豪爽，教学认真，故深受乡绅敬仰。他常讲授行侠仗义，伦理道德；对《增广》中处世哲理，讲解尤为透彻。国桢常以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请教李老师。老师对其针贬时弊的激烈言论，常婉言规劝，以防意外。

旧俗，二月十九观音会，六月初十城隍会，八月十五娘娘会，乡镇迷信活动繁多。城乡地主、劣绅、糖霸，多与县乡官吏，诸如团总、稽查，以及袍哥舵头，互相勾结，借以鱼肉乡民。余国桢对此极为不满，向南津驿总会首于子荣写警告信说：“尔等敲诈勒索，有朝一日，必将加倍偿还……。”某学友偶然从书包内发现该警告信稿，送请老师。老师阅后，连声称赞，慨叹不已。但又关切地规劝他说：“南津驿的‘鱼’吃不得，老百姓吃鱼都只能说吃‘摆尾子’（因“鱼”“于”同音，怕犯讳）。你今竟敢触犯他们，我真替你担心，也替你父母担心！”国桢悟出老师用意，说：“多谢老师指教！留得青山在，何愁无柴烧！”就把信稿毁掉了。

学馆中有一同学，是于子荣之子。他常仗势欺人，国桢十分愤恨。一天，于子无故欺侮馆中小学友，国桢上前劝阻，于子仗势向国桢恶言挑衅，竟至互相挥拳动脚，于子三次被击倒地。从此，于子再不敢横行，学友们莫不称快。

余国桢拟发警告信一事，后来传到于子荣耳里；加以其子挨打，因而怀恨在心，妄图借机报复，那善翁国桢一家。于是，国桢只好只身出走。

## 只身出走 参加革命

一九二五年六月，余国桢离家到成都。按预约，去四川法政专门学校，找到幼时在南津驿私塾同学洪沛然（地下党员）暂住学校宿舍，一切生活费用均由洪资助解决。不久，洪将国桢介绍到草堂图书馆工作，并在图书馆专门学校听课，半工半读。

当时，洪沛然同志已是“三民主义学会”成员，该学会系国民党左派领导，由CY（即共青团员）及一些中学里的进步青年联合组成。以宣传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首要任务。洪沛然介绍余国桢、曹荻秋加入该学会后，国桢同志十分热情、诚恳、埋头苦干不避余力，很快成为了学会的骨干分子。自此，国桢同志走上了革命道路。

余国桢在草堂图书馆工作不久，一九二七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六年万县发生“九、五”惨案，他先后参加了成都后援会的活动；检查仇货运动；一九二七年的成都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反劣币斗争以及裁兵裁厘运动，等等。他在这些运动中，常常站在斗争的前列，临危不惧，废寝忘食。

一九二八年初，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仍留团内，做共青团工作。

二月，成都发生了“二、一六”惨案，各大、中学和专科学校的党团骨干分子遭到了封建军阀极其野蛮的屠杀，使革命事业受到巨大损失，导致党团组织的严重危机。许多同志无法在成都立足，只好转到外地，但国桢仍留成都坚守阵

地。

一九二八年底，国桢同志在团省委工作，先后担任共青团川西特委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在他和同志们的努力下，很短时间内，就把一些学校、企业的团组织加以整顿清理，有的重新建立起来，为尔后进一步开展工作，打下有利基础。

## 组织罢工 被捕入狱

一九二九年，国桢同志担任共青团川南特委书记，是年秋他随团省委一道，迁往重庆工作。

一九三〇年任共青团川东特委书记。有一次，团省委在重庆召开会议，会上，国桢同志以他敏锐的洞察力，分析形势，详陈时局将有大变动的看法，博得同志们的赞许。当时，团省委负责人之一陈平三同志说：“这个‘月亮’真是亮得很啊！”（余国桢同志右额角有一道幼时留下的弯弯伤痕，同志们亲切地称他“月亮”。）

是年冬，党在自贡成立特委，苏幼农（即苏爱吾，邻水县人）担任特委书记。国桢同志被派到自流井工作，担任特委委员兼青年部长，积极计划组织荣县农民暴动；又在自流井组织政治性的工人大罢工，并计划组织第十六路红军（在荣县）及第十七路红军（在富顺三多寨）。国桢同志积极参加关于罢工斗争的组织领导工作，日夜深入各井灶工人群众中进行活动，与工人亲密无间，情同手足。有时同开明盐商及财界中间派人士，接触周旋，争取进步人士的同情与支持，以便在工人群众的频繁活动中更为主动，并间接牵制、瓦解敌方力量，增强革命力量，以争取大罢工的胜利实现。当时工作重点是：（一）分别在长土、大坟包、

郭家迳等地，建立各井灶的工厂委员会，踏踏实实地巩固工人群众的基层组织。（二）积极策划成立自贡盐井工人赤色总工会，以便统一领导这一斗争。

成立工厂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一天夜晚，在自井到贡井途中一个古庙内，召开成立赤色总工会的工人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工人代表约有三百多名，代表们情绪极为热烈。大会结束后，天降大雨，一些工人竟冒雨回家，并在沿途高呼口号，以致引起反动军警的极大震动。伪川南警备司令部于次晨在贡井小溪进行了大围捕，余国桢同志不幸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宜宾团委书记蔡涛同志。

蔡涛，是当时川南警备司令蔡玉龙的堂侄，在司令部内，一些军官同蔡涛也有家族或同乡关系。被捕前数月，蔡涛同志还去过该部，为准备组织罢工的需要，在经济上曾取得一些实惠。

余、蔡被捕后，全案移地方法院审理，首席检察官廖耀渊（金堂县人）秉承蔡玉龙旨意，对余、蔡审讯，软硬兼施，手段卑劣。余国桢同志立场坚定，警惕性高，怕蔡涛同志为家族关系所惑，经不起考验，他对蔡涛说：“每当革命越艰苦越困难时，我的脑子越清醒，真理也就更加闪光。”他特别强调“抛弃任何幻想，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斗争，一切不可以叔侄关系，向军阀蔡玉龙求救。”因此，他们在狱中，不为威胁所屈，不为私情所动，使敌人毫无所获。余蔡两同志在狱期间，地下党亦多方营救，致使廖耀渊一筹莫展，始终抓不到证据，不敢轻举妄动。历时两个多月，最后以“不予起诉”结案，宣布释放。

不久，蔡涛同志返回宜宾，再次被捕，英勇牺牲。

## 临危不惧 挺身而出

余国桢同志出狱后，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奉命以共青团特派员名义去万县，参加下川东特委的领导工作，积极整理和发展川东共青团组织。

余国桢同共产党下川东特委书记苏幼农及其爱人黄梦谷（特委秘书）和小交通员王牛儿共四人，住在特委机关里。他们处境十分困难，生活异常艰苦。但国桢同志生气勃勃，斗志甚旺，开会，写材料、看书报、教小交通员学文化，不分昼夜忘我工作。

时值下川东地下党组织，在万县召集各县党的负责人开会，由特委书记苏幼农同志和国桢同志轮流主持。一天，苏出去开会，时过中午未回，国桢估计不妙，准备应付事变。次日派小交通员侦察无结果。傍晚国桢同志顶着凛冽寒风，潜入苏开会地点——兴盛旅馆打听情况。直到第三天才弄清楚，由于叛徒出卖，苏幼农同志已被捕，敌人连夜出动，妄图一网打尽，情况异常危急。国桢同志带领黄梦谷及小交通员巧妙避开敌人，立即从水路突围。

木船行至中途，又遇一股土匪。土匪见他们无物可劫，便将黄梦谷同志拖到距江边不远的匪窝龙王庙内，想加以侮辱。国桢同志不顾危险，只身找到戒备森严的匪窝，同匪首交涉。他公开讲明：“我们是共产党员，同你们无冤无仇，你们不能侮辱妇女！”在万分危急时，救出梦谷同志。

到丰都县，国桢同志安排好小交通员，派黄梦谷到重庆报告省委。然后，他再到川东各地巡视。他曾惋惜地说：“若不是处境艰危，我一定把叛徒抓来审判！”

一九三一年底，国桢同志随团省委迁蓉。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期间，他曾任共青团四川省委组织部长和书记，并一度担任《成都快报》副刊编辑。一天早上，他与陈平三同志一起，去蜀华街都鹤楼肺病疗养院，见到张翰年同志（张也是地下党员，当时任快报经理），谈话间，适逢《成都快报》社长方镇华来访张，商讨聘请副刊编辑的问题。张向方说：“聘请副刊编辑的先生，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当即将余国桢介绍给方镇华。此后，他就在《成都快报》工作。

国桢同志文笔犀利泼辣。常在快报副刊发表短文，深受读者欢迎，也因此成为军阀、政客们眼中钉。

国桢同志在快报副刊上，连续发表短评，历数吴佩孚乱川祸国之罪，淋漓致尽，如投枪匕首。在一篇时评中，详尽阐述“所有现政府一切措施完全无效”之种种理由，对各界各阶层震动很大。

《成都快报》后台，二十八军军长邓锡候，是拥护“吴大帅”的重要人物。方镇华认为这几篇文章，违反了邓的旨意，因此极为不满。国桢同志对方毫不让步，据理力争，从此方常对国桢同志百般刁难。为了有效隐蔽自己，根据组织上指示，国桢同志于一九三二年十月，离开《成都快报》社。

国桢同志在成都，积极恢复、整理、发展四川共青团组织的工作。动员和组织共青团员及革命青年去拉黄包车，去当各种工人作工人运动；打入国民党军阀内部当兵，秘密传播革命道理，作革命的士兵运动，准备和发展兵变；反对吴佩孚等军阀战争，反对进攻红军。其后，经常往来成渝之